



人们为何渴望权力：本性、病理与替代之路

简体中文

<https://prompting-query.com/zh/books/year-2025/why-people-want-power/>

人们为何渴望权力：本性、病理与替代之路

汇集各部分的完整著作

引言

当今世界的权力悖论

权力，是人最渴望、也最诅咒的一种处境。我们追逐它，却鄙视那些已经得到它的人；我们批评掌权者，心底又暗暗羡慕他们能做的事。我们梦想一个没有强迫的世界，却不断造出新的控制方式。这一悖论贯穿人类历史，在我们的时代显得格外尖锐。

二十一世纪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平等协作机会：互联网、区块链和社交网络让数百万人不靠中央指挥，也能协调行动。可与此同时，我们又看到威权倾向抬头，新的数字极权形式出现，算法对人的行为施加控制。这是为什么？

传统的解释——经济利益、心理情结、历史习惯——似乎都不够。它们说得清权力怎样运作，却说不清人们为何仍如此渴望它，哪怕它让掌权者和周围的人都饱受痛苦。

也许问题在于，我们一开始就误解了权力的本质。我们把它看作工具，看作达成目的的手段。可要是权力不是手段，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呢？不是工具，而是一种令人上瘾的东西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而是逃避问题的去处？

研究的目的与方法

这本书试着从存在哲学，而不是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权力。我们关心的不是政治制度如何搭建，而是一个人一旦能够支配他人，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。

我们的出发点是：人追求权力，往往并非出于理性盘算，而是出于对意义、掌控感和自身分量的存在性需求。权力成了填补内心空洞的方式，让人以为自己的存在举足轻重。

可悖论在于，本该赋予人生意义的权力，常常反而夺走意义。一个人控制了别人，却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；登上顶峰，才发现那里空无一物。

我们的分析遵循几项原则：

忠于经验的现象学原则：我们尽力描写掌权者自己怎样体验权力，而不是依照理论规定权力应当是什么样子。

历史视角原则：我们考察权力形式从古至今的演变，看看它的机制如何变化，而核心又如何延续。

批判分析原则：对于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权力辩护，无论宗教的、世俗的还是技术至上的，我们都不照单全收。

另寻可能的原则：我们认真思考，一个社会是否能不依靠传统的权力形式而存在。

本书的结构

本书分为四个部分，每一部分探讨权力问题的一个侧面。

第一部分：权力的本性探寻支配欲的生物、历史与心理根源。我们将从动物的等级秩序一路追踪到现代国家，看看社会条件如何塑造人对控制的需要。

第二部分：控制的机制分析权力在现实中怎样运作。从古代的武力强制到今天的算法治理，我们将考察权力技术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意识的影响。

第三部分：危机与病理聚焦权力的阴暗面：它既能摧毁行使权力的人，也能摧毁服从权力的人。我们将探讨权力失去意义、沦为自身目的的现象，以及抵抗与拒绝的种种形式。

第四部分：替代之路与未来思考如何超越传统权力形式。从平等的社群和网络组织，到对“治理”这一观念本身的彻底重想。

这本书并不自称握有最终答案。它想做的，是提出恰当的问题。当旧有的权力形式陷入危机，新的形式又尚在成形，我们不仅需要懂得治理怎样运作，也需要理解那些渴望治理他人的人，内心深处究竟受什么驱动。

也许，看清自己为何迷恋权力，我们就能找到更健康的方式，回应内心对意义的需求。也许，认清许多控制形式的病态，我们就能创造更有人情味的替代选择。又或许，我们至少能诚实承认：追逐权力是人性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，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处。

这本书邀请我们与自己展开这样一场对话。

第一部分：权力的本性

第一章：生物与历史的根源

支配的本能

观察狼群，我们会看到人类学家所说的“自然等级”。首领不是靠民主投票选出来的，它凭力量、计谋或魅力取得地位。其余成员不仅服从它，还会抵御来自外部的挑战，守护这套等级秩序。

人类承继了数百万年的进化，支配的本能像进食和繁衍的需要一样，深植于我们身上。在任何人群里，从幼儿园到董事会，等级都会自发形成。有人带头，有人跟随。这往往自动发生，并不需要谁有意识地作出决定。

不过，人类的权力与动物的权力有一个根本区别：掌权者不在场，权力也能继续存在。头狼必须不断重申自己的优势；人间的统治者却可以远在千里之外，统治整个帝国。

这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人类有独特的象征能力。权力从肉体的力量变成象征——王冠、宝座、印章、签名。也正因为这种象征性质，人类的权力比动物的权力更强大，同时也更脆弱。

从部落到国家

在原始部落里，权力依附于具体的人，也受到限制。首领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，却不能逼迫族人交出妻子或孩子。他的威望来自个人的力量、智慧，以及与神灵沟通的能力。

农业革命改变了一切。剩余产品、私有财产和社会分层出现了。权力不再是暂时承担的职责，而成了可以继承的特权。国王之所以统治，不是因为他们最强或最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出生在“对”的家庭。

古埃及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第一种全面权力的模式。法老不只是统治者，也是神。他的权力不只及于生者，也延伸到死者。金字塔不只是陵墓，更是对时间与空间实行绝对控制这一观念的实体呈现。

希腊城邦提出了另一条路：民主。但权力在这里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变成集体的权力。公民大会可以判苏格拉底死刑，像暴君处死一个失宠的臣子一样轻易。民主没有废除权力，只是重新分配了它。

罗马帝国把此前种种形式综合起来。皇帝既是统帅，又是最高祭司；既是法律的化身，也是国家的象征。罗马的权力无所不及，却也讲求理性。它建立的法律体系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

中世纪带来一个新观念：权力是对上帝的侍奉。国王统治，并非因为他是最强的人，而是因为他受了神的膏立。这既使权力更具正当性，也为它加上更多约束。君主不仅要要对臣民负责，也要向至高者交代。

近代使权力走向世俗化。启蒙运动以社会契约取代君权神授。权力成了人们为解决共同问题而建立的理性安排。可悖论在于，权力得到理性解释之后，范围并未缩小；恰恰相反，现代国家对公民生活的控制，比任何中世纪君主都更无所不及。

权力作为群体的生存机制

为什么即使等级制度对自己不利，人们还是要建立它？为什么穷人会捍卫压迫自己的制度？为什么革命者刚推翻旧政权，立刻又建立新政权，而且往往更加残酷？

答案或许藏在权力作为群体生存机制这一点上。当资源有限、外部威胁逼近时，没有领袖的群体可能分崩离析。权力不只是剥削的手段，也是一种协调方式。

想象一个遭到袭击的部落。它有两种选择：每个人各自为战，或者所有人服从统一指挥。敌人弱小时，前者或许行得通；敌人强大时，后者就成了必要选择。选择第二条路的群体更常存活下来，于是自然选择把服从的倾向留在了我们身上。

然而，正是这种倾向也使我们容易受人操纵。历代政治人物都利用真实或虚构的威胁巩固自己的权力。“敌人就在门外”，是让人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的最有效说辞。

当代研究表明，人在压力、不确定性或威胁之下，更容易接受威权式的决定。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大流行让我们看到，民主社会能够多么迅速地以集体安全为名，接受对基本权利的限制。

可有别的路吗？群体能否不靠等级秩序而生存？无政府主义社群的例子表明，这并非不可能，但需要十分特殊的条件：群体规模小、成员彼此高度信任，而且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。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再成立，群体要么建立等级，要么走向解体。

第二章：权力的社会基础

对混乱的恐惧与对秩序的需要

卢梭写道：“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但假如这副枷锁不是别人给我们套上的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呢？假如我们创造权力，正是因为害怕没有权力的生活呢？

混乱不只是杂乱无章。它意味着我们无法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。混乱中没有规则，也就没有安全。任何人随时都可能成为受害者，也可能成为施害者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人无法筹划未来、建立关系，或创造长久之物。

权力提供了混乱的另一面：秩序。即便这种秩序不公正，即便它限制自由，至少它可以预测。在权力强大的国家，一个人知道，只要遵守规则，大体上便能保住性命和财产。

霍布斯把这种用自由换安全的安排称为社会契约。人们自愿放弃为所欲为的权利，换取别人也同样受到约束的保证。权力在这份契约中充当仲裁者。

但如果掌权者违背自己的契约呢？如果它不再提供安全，却仍要求服从呢？按理说，契约此时应当解除。然而现实常常相反：人们仍紧抓着失灵的权力不放，因为他们对混乱的恐惧，甚至超过对暴政的恐惧。

当代俄罗斯就是这种处境的鲜明例子。许多俄罗斯人对当权者持批评态度，投票时却仍支持他们，因为他们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混乱。“起码还有秩序”成了最有力的政治理由。人们因此忽略了一点：没有发展的稳定，不过是一场缓慢的死亡。

资源有限与竞争

假如资源取之不尽，我们还需要权力吗？在富足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能尽量取用，又不会损害别人。冲突会消失，仲裁者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。

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。即便最富有的社会，也缺少某些东西：时间、注意力、地位、意义。只要有稀缺，就会有竞争；只要有竞争，人们就会需要游戏规则和维护规则的人。

权力，是把稀缺资源分配制度化的一种方式。它决定谁得到什么，以及凭什么得到。在传统社会，分配往往取决于出身；贵族得到更多，只因为他们生在“对”的家庭。

资本主义提出了新原则：任人唯才。资源应归那些凭才能和努力赢得它的人。可在现实中，任人唯才常常又变成新式的世袭特权。富家子女拥有更好的教育、人脉和起步机会。“机会平等”仍是一个神话。

社会主义试图用激进的办法解决问题：废除私有财产，按需要分配资源。但由谁界定这些需要？由谁决定建工厂还是建医院更重要？一个负责规划的机构不可避免地出现，并获得对人们生活的巨大权力。

当代数字经济又创造出新的稀缺形式。注意力成为最重要的资源：它可以变现，可以被操纵，也值得争夺。平台所有者获得权力，不是因为他们掌握土地或工厂，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信息的流动。

关于权力的文化叙事

权力需要理由。光靠强迫还不够，还得让人相信强迫是公正的。每个时代都会编出自己关于正当性的故事。

古人用神圣的出身为权力辩护。法老是神的儿子，中国皇帝是天子，罗马的凯撒是诸神的后裔。这些故事之所以奏效，是因为人们相信神，也接受等级分明的世界图景。

基督教改变了这套故事，却没有将它废除。权力仍来自上帝，但统治者只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。这既使权力更具正当性，也使它承担更多责任。国王不能只为自己的利益行事，还必须侍奉至高者的旨意。

启蒙运动使权力世俗化。如今权力不再来自上帝，而来自人民。统治者通过选举或革命获得授权。可悖论在于，民主权力未必比神授权力少一点极权色彩。“人民的意志”和“上帝的意志”一样，也是一个抽象概念。

二十世纪出现了新的叙事：科学的、技术官僚的、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。权力不再诉诸传统或意志，而诉诸知识。共产主义者声称自己懂得历史的规律；自由主义者声称懂得经济的规律；技术官僚则声称懂得社会如何运转。

二十一世纪正在制造算法的叙事。权力流向拥有数据、又能处理数据的人。既然人工智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，它似乎也就能替我们作决定。这是所有故事中最诱人的一个，因为它许诺了一种不必负责的权力。

第三章：追求权力的心理

填补内心的空洞

“贪恋权力的人，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。”一位智者这样说。这句话所含的真实，可能比乍看之下更多。追求权力的根源，往往不是力量过剩，而是力量不足。

想象一个缺乏自信的人：他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，也怀疑自己是否有价值。权力给了他一个看似简单的答案。只要能够控制别人，他就立刻变得重要；只要有人服从他，他似乎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人。

可这只是一场幻觉。权力不能塑造一个人，只能遮住这个人。统治者的长袍下，也许藏着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，害怕独自面对内心的疑问。掌权者因此死抓着职位不放：一旦失去它，就可能看见自己的空洞。

历史上不乏以外在的伟大弥补内心情结的统治者。拿破仑或许征服欧洲，是为了向自己证明，身材不高并不意味着低人一等。斯大林或许杀害数百万人，是为了忘掉自己的小地方出身和身体缺陷。

当代研究支持这一假说。自我评价较低的人，更常渴望得到能够支配他人的位置；他们使用权力时也往往更残酷，仿佛要向自己和世界证明：他们确实强大。

然而，这种弥补不起作用。缺乏自信的人得到越多权力，焦虑反而越强。他开始怀疑人人都在密谋，在无害之处也看见威胁，把阿谀奉承者和告密者围在身边。本该给他信心的权力，最终把他变得疑神疑鬼。

权力作为自我肯定

追求权力的另一个动机，是渴望得到承认。人想感到自己有分量、被需要、很重要。在传统社会，这种感受可以通过技艺、智慧和服务社群来获得。到了现代，这些道路却失去了往日的声望。

权力仍是获得社会承认的少数途径之一。电视屏幕上的政治人物、杂志封面上的首席执行官、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博主，都得到了人人渴望的东西：关注与尊重。

可这份承认是一场幻觉。人们敬重的不是掌权者这个人，而是他坐的位置。一旦失去权力，敬意便烟消云散。昨天还在谄媚的人，明天就会嘲笑他。卸任的总统对此最有切身体会。

更何况，权力常常毁掉一个人原本值得真正尊重的品质。周围的人不敢批评，掌权者便停止成长；身边的信息都经过控制，他便与现实失去联系；他分不清谁是出于算计亲近自己、谁是真心相待，也就渐渐失去了建立真诚关系的能力。

尤其令人悲伤的是，有些真正才华出众的人也登上了权力的位置。权力没有放大他们的才能，反而毁掉了才能。天才科学家做了部长，不再从事科学研究；有才华的作家获得政治职务，渐渐失去创作能力。

掌控与意义的幻觉

也许人追求权力最深的原因，是存在的焦虑。人是唯一知道自己终将死去的动物。这种认识带来恐惧，而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战胜它。

其中一种办法，就是制造掌控的幻觉：如果我能支配别人，面对命运时就不是无助的；如果千百万人的生命取决于我的决定，我自己的生命就一定有意义。

权力给人一个独特的机会，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。统治者颁布一项法律，数百万人便改变行为；他发动一场战争，历史就转向另一条路；他立起一座纪念碑，自己的名字似乎就能流传百世。

然而，这也是骗人的幻觉。一个人的权力越大，他越清楚地看见它的边界。他能支配别人，却不能支配时间；能修改法律，却不能改变死亡；能被写进历史，却仍无法逃过自己的有限生命。

更糟的是，权力常常不是赋予人生意义，而是夺走意义。掌权者成了自己职位的囚徒。他不敢自然地、真诚地、脆弱地生活，只能一刻不停地扮演角色，戴着面具，活成公众期待的模样。

于是，那个为寻找意义而追逐权力的人，最后发现自己已失去了自己。本应帮助他实现自我的东西，变成了一座牢笼。看似通往自由的权力，到头来竟是另一种奴役。

这也说明，为什么许多掌权者临终时会感到深深的失望。他们得到了曾经追求的一切，却没得到真正寻找的东西。他们想成为神，结果成了某种职能；他们梦想不朽，得到的却只是更精巧的提醒：自己终有一死。

第二部分：机制与病理

第四章：人们为何渴望权力——哲学上的思考

追逐权力，是人类最古老、也最持久的动机之一。它既有历史的根基，也有生物的根基：支配、建立等级和控制资源的本能，使权力显得诱人，甚至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或缺。在历史中，这份渴望化身为英雄、酋长和君主；围绕这些人物建立起来的，不仅是国家，还有整套价值体系。

然而，不管这份动机有多持久，社会条件总是一再逼我们重新思考掌权的理由。资源有限、相互竞争、对混乱的恐惧，使人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：为什么是这种权力？为什么在此时？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？文化和教育在此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：它们教我们把权力看成目标、可以达到的地位和成功的标志。这些理由沉入神话，由父母传给子女，成为教育的一部分。

可问题仍然存在：假如人类历史从未使追求权力成为必需，会怎样？设想一个不以等级为基础、由横向关系取代纵向关系的世界。那里的生活会截然不同——也许更灵活，也许更混乱，但肯定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。我们理解正当性的方式也会彻底改变：如果权力不需要理由、不需要解释，人们或许会觉得它天经地义，也或许会觉得它荒诞可笑。

正是在这里，理由成了阻止权力任性妄为的东西。我们想相信权力有其根据，不是偶然，不是一时兴起，更不是错误。这样的信念给我们可预期感、道德上的稳定感与信任。没有它，权力在观察者眼中便成了暴政，或成了混乱。

但假如连这个理由也只是事后的辩解呢？那它便不是权力的先因，而是跟在权力身后的装饰或外壳。明白这一点，公正感就会动摇：如果理由是幻觉，权力本身也可能不过是一场自欺。

理由常被用来声称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。它不只是逻辑上的解释，更是对真理的宣称：由我来决定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政治辞令正建立在这上面：“我们有权，因为……”这类说法蕴含着让权力稳定、可传承、显得正当的力量。但别忘了，有时它只是一层外壳，里面藏着赤裸的力量、控制和强迫。一旦外壳变得透明，权力就失去了魔法，露出它作为机制的本来面目。

权力若连神话式的理由都没有，就会空空如也。人们只会因为恐惧或惯性而服从。但只要还存在某个理由，哪怕争议重重，权力便能继续存在。危险也在这里：如果理由失去实质内容，权力就会变成操纵；支撑它的不再是信服，而是人的无力反抗。

一些研究者认为，追求权力最基本的原因是恐惧。对无政府状态、失序和没有界限的恐惧，推动人们服从。权力许诺安全和稳定，哪怕代价是自由受限。嫉妒、个人魅力、自我肯定的渴望等其他原因也在发挥作用。有时权力只是自保的手段，有时则是补偿内心焦虑的方法。

设想权力来自爱，而不是恐惧。在那样的社会里，领导意味着照料，而不是支配；权力意味着服务，而不是统治。可能吗？在理论上，可能。但现实中，这样的权力形式稀少而脆弱。以爱为根基的掌权愿望，需要整个社群来支撑，而不能只靠掌权者一人。

假如权力生于抗议，它就不会维持现状，而会努力打破现状。那时，权力本身将表达革命的冲动、持续的更新，以及对固定等级的拒绝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它失去稳定局面的作用，成为推动变化的工具，同时也成为不稳定的来源。

然而现实有一个悖论：一个人获得的权力越多，就越容易失去自己。取得控制的那一刻爆发的存在危机，暴露出内心的空洞。原来权力不一定带来意义，反而可能将意义毁掉。于是他感到，权力不是高峰，而是深渊。

第五章：权力的无意义与文化的戏仿

权力显得毫无意义，不只是个人危机造成的，也可能出于制度性的原因：失败的改革、腐败、意识形态的疲惫。当权力不能取得结果，它就像一场低效的表演。人们失去信任，拉开距离，不愿再参与政治。权力成了笑话——不再是工具，而是一出闹剧。

设想一个社会，在那里权力始终显得充满意义。或许，人们就不会发展出怀疑的哲学，也不会寻找别的治理形式。但推动思想与社会前进的，恰恰是这种怀疑。它催生批评、抗议与重新思考。

如果权力的无意义感没有带来冷漠，反倒把人唤醒，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就会出现。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参与，寻找投入公共生活的方式，要求掌权者负责。但这也常常导致立场激进化。一个想通过权力寻找意义的人，可能落入自欺的陷阱，让权力成为内心空洞的替代品。

他可能相信，只有拥有权力，自己才会变得重要。无意义感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被头衔、影响力、下属这些外在标记遮住。可它们背后常藏着一个不安的念头：“要是这一切根本没有意义呢？”这种焦虑足以从内部摧毁整套结构。权力于是失去稳定，正当性危机随之开始。

有时，这表现为文化上的戏仿：权力成了嘲笑和讽刺的对象。过去被视为庄严的仪式，如今显得空洞。如果权力宣称的目标与实际结果不符，它的根基便开始瓦解。人们不再相信承诺，权力也就失去了未来。

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方面：权力的根据。没有根据，权力就成了暴力。有些文化把权力当成一种自然现象，认为它就是“存在着”，无需解释。但在另一些环境中，尤其是民主社会，没有根据的权力会被视为威胁。

正因如此，人们才会讲述君权神授、传统，以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契约的故事。根据赋予权力正当性：法律把它写成规范，文化保护它，教育解释它。这些共同造出一种公正感。人们觉得自己服从的是一套道理，而不是某个人的任性。

但假如根据只是一道烟幕呢？假如它没有反映现实，反而遮住了现实呢？那权力便成了操纵。如果根据变得过于频繁——从宗教换成进步，从进步换成安全，再从安全换成生存——这种反复的重新辩护尤其会侵蚀信任。权力失去稳固的支点。

当根据不清楚，解释权之争便开始了。一方说权力在保护人，另一方说它在威胁人。在这场争夺里，获胜的往往不是有理的一方，而是嗓门更大的一方。制度由此崩塌，民粹主义由此兴起，共识由此消失。

如果个人魅力取代了根据，权力便系于某一个人。这很危险：魅力会随人逝去，继承却并无明路。权力于是变成一场演出。演出结束时，人们只能独自面对空洞。

有时，所谓根据不过是习惯：“一直都是这样。”传统的力量正在这里，它的弱点也在这里：它不给更新留下余地。权力就此凝固，像一具制成木乃伊的躯体。它不再生活，只是存续。

尽管根据如此脆弱，它的存在仍能支撑人们对公正的感受。只要人们懂得、并认同权力存在的理由，艰难时期也会接受它。没有这样的认同，剩下的只有恐惧，或冷漠，或反抗。

第六章：权力剖析——从本能到幻觉

作为必然悖论的权力

权力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、却又充满悲剧性的悖论。它最初作为理性的工具出现，用来战胜混乱、保障生存，却不可避免地生出自己的非理性病症：疏离、无所不及的控制和存在的空洞。这又迫使人类不断以拒绝和创造替代组织形式来寻求解放。然而，新的形式也始终有变成更精巧的新等级秩序的危险。

无法回避的诱惑

这本书写的是人类所知最强烈、也最危险的诱惑：权力。我们追逐它，为它争斗，因它受苦，推翻它，然后……又以新的形式把它重建。权力像火，能供人取暖、照亮道路，也能把一切烧成灰烬。

权力为何有这样强的吸引力？人得到它之后，又为何常常只感到失望和空虚？这本书试图一路走向权力的根源。我们将从生物本性中幽暗的本能深处出发，那里孕育着支配的欲望。接着，我们会看到，人类如何因为害怕混乱，自愿创造出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力量，借它来约束混乱。我们也会分析那些伟大的故事与幻觉——从君权神授到人民主权——如何让权力不只是力量，还被看作一项正当的权利。

旅程并不会到此为止。我们还要绕到权力庄严的门面背后，看看它的病症：统治者的存在危机、对全面控制的痴迷、令人窒息的仪式空虚。最后，我们会探寻解放之路：从个人安静的拒绝，到大胆尝试建立没有等级与强迫的社会。

这是一趟从本能走向幻觉、再折返回来的旅程。它并不打算给出最终答案，而是想提出恰当的问题。看清权力的构造，是不做它奴隶的第一步。

第三部分：替代之路与抵抗

第七章：拒绝的哲学——从斯多葛学派到数字戒断

当权力体系变得无所不及、压迫人，或失去意义时，最早、也最贴身的抵抗行动就是拒绝。它不一定是打着旗帜走上街垒的喧闹起义。更多时候，它是一个安静的内心举动：决定对别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说“不”。拒绝，是重新握住自己生活主权的办法，是在体制试图抹去边界的地方，再次划出边界。

斯多葛学派与犬儒学派

最早把拒绝视为生活策略、看见它力量的，是古代的哲学家。在一个充满暴君、战争和无常命运的世界里，他们寻找保住内心自由与平静的方法。

斯多葛学派——塞内加、爱比克泰德、马可·奥勒留——提出了一个精妙的办法：把世上的事分成我们能够掌控的，以及我们不能掌控的。我们能掌控的，只有自己的思想、判断和反应。其余一切——身体、健康、财富、名声、别人的行动——都不由我们决定。在斯多葛学派看来，明智的人应当把心力全部放在自己能掌控的事上，对外在的一切保持彻底的平静与不执著。

犬儒学派走得更远。他们的拒绝不仅发生在内心，也公开展示在生活里。其中最著名的锡诺普的第欧根尼住在一只大陶缸里，鄙视社会习俗和财富。传说亚历山大大帝对他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”他回答：“别挡住我的阳光。”这次著名的相遇，把拒绝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禁欲与隐居

几乎所有世界性宗教都有禁欲的传统：为了精神上的觉悟，自觉放弃世俗的好处、享乐和社会联系。僧人、隐士、圣者做出的是一种彻底的拒绝：舍弃此世所看重的权力、财富与名声，追求另一个世界的价值——灵魂得救、涅槃，或与上帝合一。

政治上的拒绝与不服从

二十世纪，拒绝成了有力的政治工具。圣雄甘地把非暴力抵抗和公民不服从化为一种策略，最终促成印度独立。他所说的“坚持真理”（satyagraha），就是拒绝与不公正的权力合作。

当代的拒绝方式

在后工业社会，控制越来越少以肉体暴力的方式出现，越来越多表现为消费竞赛和信息过载。于是，人们也找到了新的拒绝方式：

- 降速生活——离开薪酬丰厚却令人长期紧绷的职业道路
- 极简主义——有意识地拒绝过度消费
- 数字戒断——暂时或持续地拒绝时时在线

第八章：横向组织的替代选择——寻找新的社会

拒绝能够解放个人，却也让他独自面对庞大的体制。接下来合乎情理的一步，是让那些说了“不”的人联合起来，建立新的社群，以不同于权力、等级和强迫的原则共同生活。

无政府主义作为替代选择

对权力最彻底、也最激进的替代选择，是无政府主义。与常见的误解相反，无政府状态并不等于混乱；它是一种复杂的自组织体系，以自愿合作、互助和没有强迫为基础。

在西班牙内战期间（1936—1939年），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曾出现大片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的地区。工厂和土地被集体化，交由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管理。货币被废除，决定则在全体会议上作出。

当代实验

- 生态聚落与公社——成千上万个小型社群，尝试以共识作决定
- 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运动——按照mandar obedeciendo（“服从地治理”）原则生活的自治市镇
- DAO（去中心化自治组织）——借助区块链技术，尝试建立完全透明、民主的治理制度

无结构的悖论

所有这些实验都遇到一个根本悖论。美国女权主义者乔·弗里曼在《无结构的暴政》一文中指出，摒弃正式结构并不会自动带来平等。相反，权力会变得看不见、不正式。

结语：必然，还是选择？

我们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段旅程：人们为何渴望权力？我们发现，它的根扎在生物本性里，扎在远古对混乱的恐惧里，也扎在永不停息的秩序渴望里。权力不是历史偶然生出的怪念头，而是人类面对生存难题时的一种根本回答。

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这个回答又生出新的、更难的问题。原本为了保护人而造出的工具，变成了控制人的机制；原本应当赋予生活意义的结构，把人推入存在的空洞。我们追踪了权力怎样从有名有姓的首领，演变成没有面孔的算法，而它内在的悲剧却始终没有改变。

面对这场悲剧，人类一直在寻找解放之路。我们看过个人拒绝的力量：从斯多葛式的向内退守，到今天的数字戒断；也看过建立无等级社会的勇敢实验：从无政府主义公社，到去中心化的网络。

于是，我们又回到最初的悖论：任何一次拒绝、任何一种替代方案，会不会只是更精巧的新权力的胚芽？今天的革命宣言，明天会不会变成国家教条？平等的社群，会不会长成新的官僚机构？

这本书不给这个问题最终答案。也许答案根本就不存在。但它留下几点重要的认识：

- 以清醒保护自己：理解权力的本性与病症，是防止权力被滥用的第一道、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。
- 替代方案的价值：即使乌托邦无法抵达，只要它们作为思想和实验继续存在，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就不能彻底僵化。
- 未来的权力：权力的未来，很可能取决于它能否约束自己，并与不依靠等级的体系相结合。

因此，权力的历史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支配本能与自由渴望永恒拉扯的循环。也许，人的真正任务不是在这场斗争中一劳永逸地获胜，而是学会与这无法消除的矛盾共处，同时守住尊严与选择的权利。

参考文献

[此处应列出所引用的文献]

主题索引

[此处应按字母顺序列出主要概念与人名的索引]